

· 土耳其国家治理 ·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多重向度 与土耳其国族认同*

李艳枝

内容提要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活动场域，国族认同是维系现代民族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凯末尔时期的民族主义在整合东西方民族主义要素基础上参与民族国家构建而呈现不同向度：基于领土认同的政治民族主义，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确定民族国家的疆界范围，奠定了国族认同的疆域基础；基于公民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以宪法为根据强化土耳其人的公民权利，构成了国族构建的正当性基础；基于语言文字统一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土耳其语言文字为媒介，巩固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基于同质化民族构筑的族群民族主义，以语言文化历史观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寻找国族认同的科学依据。民族主义呈现融合性、多元性、工具性甚至矛盾性特征，体现了构建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式的尝试，但其不同向度使得民族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附属产品而出现，为新奥斯曼主义获得发展空间，促进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而成为当下民族主义回潮、“全球南方”崛起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民族主义 土耳其 凯末尔 民族国家构建 国族认同 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 李艳枝，辽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回潮、“全球南方”崛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给民族国家带来诸多挑战。伴随着世界

*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土耳其语言政策与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3 - 1950）”（LJ112410140097）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诸多国家自主发展意识空前增强，追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吁求更加强烈，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加显著。上述现象固然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与诸多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密切相关。民族为拥有疆域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有主权和相互黏合的共同体，它与现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国家。^① 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和文化的。”^② “国族就是指在一国范围内，各种民族共同体因相互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而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以国民为族名的一体化过程。”^③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主权、统一和独特的民族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央，并且用它们的形象来塑造整个世界，^④ 民族国家构建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既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活动场域，也逐渐培育了民众的认同意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统合形成国族认同，进而成为维系现代民族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视角审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和多重向度，既有助于剖析当下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图景，还有助于揭示民族主义的融合性、继承性、断裂性甚至创新性特征，进而有助于厘清不同国家的国族认同、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逻辑，因而对该议题进行个案研究尤为重要。

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按照源于西欧的、将民族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来创建民族国家，但凯末尔政权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受到东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是在习惯法和共有领土范围内的公民理性联合，而东方的各种民族主义形式则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和族群本原的信仰基础之上”^⑤，这使土耳其民族主义呈现不同向度。在百年历史征程中，凯末尔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被写入宪法，指导现代化进程；民族主义作为不可更改的原则写入 1982 年宪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常研常得

① 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② [英国] 戴维·米勒、[英国] 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28 页。

③ 余建华著：《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变幻》，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9 页。

④ [英国]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 51 页。

⑤ 同上书，第 43 页。

的重要议题^①。“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即内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随着更广泛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发生，多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世界主流，因此，国家建构需要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需要突破单一民族界限而提供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忠诚。”^②由此可见，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族认同形成具有内在相关性。本文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尝试从领土、公民、文化和族群的不同维度及其内在逻辑出发，探索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互动，厘清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理论范式与国族认同的内在关联，进而着力构建不同于西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以期找到化解土耳其民族问题的路径和破解当前关涉民族主义议题的困境。

一 基于领土认同的政治民族主义

以领土界线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定“领土是现代国家必要的构成要素，清晰且稳定的边界以及对领土的权利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③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伴随着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独立和阿拉伯人省份的丧失，聚焦安纳托利亚领土范围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涌现，从青年奥斯曼党到青年土耳其党的发展体现了领土主权意识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休·希顿-沃森认为，“民族主义运

^① 国内学术界关于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彭树智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指出凯末尔主义是亚洲民族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财富。随后，学者在探索土耳其现代化模式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著述中提到凯末尔民族主义。笞涛博士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基于理论与实践来源、革命话语、领袖的民族观、重构民族历史和“公民宗教”的等维度，回答了族史重构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国内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其他研究成果如《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六日演讲”文本看凯末尔的多面性》《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等从不同视角谈及凯末尔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侧重从奥斯曼历史遗产、民族独立运动、世俗化改革、语言文字改革、“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土耳其历史大会和语言大会等微观角度，分析凯末尔民族主义的构成要素及其对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不过，现有研究成果较少关注凯末尔主义与国族认同之间关系，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族认同的内在逻辑也鲜有涉及，相关研究主题有待于深入探究。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本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② 林红：《族群民族主义的复归与民族国家的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第56页。

^③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48页。

动寻求两大目标：一是民族独立，即建立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二是民族统一，即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民族团体（这些民族团体或者自称，或者被声称属于同一个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尽管现实世界并非全部如此，但在许多情况下，民族主义者承担着进一步的任务：即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里构建一个新民族。”^① 安娜·玛利亚·阿隆索断言，“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主体，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生物文化本质的超级有机体的界限，复制了国家领土的封闭性。”^②

民族国家构建的第一步是先确定边界和领土范围，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使边界范围内的居民逐渐凝聚成一个牢固的共同体——民族。1918 年 10 月 30 日，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署了《摩德罗斯停战协定》，规定协约国可以占领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民族危机加剧。1919 年 5 月 19 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开始组织民族抵抗运动。6 月 21 日至 22 日，凯末尔在阿马西亚发布通告，强调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7 月 23 日至 8 月 17 日，埃尔祖鲁姆护权协会代表大会（Erzurum Congress）召开，凯末尔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奴役，号召人们丢掉对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幻想和依靠自己力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指出在（未确定的）国家边界内的整个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外国强行占领土耳其地区的行为都将遭到强烈反对。”^③ 大会通过护权协会章程和告全国人民书，主张领土完整，统一全国护权组织力量，明确指出如果伊斯坦布尔政府不能保证国家独立，就有必要另建一个政府。^④ 9 月，在锡瓦斯召开的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凯末尔主持讨论并通过锡瓦斯纲领，确认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干涉土耳其。大会把“东部各省民族护权协会”改为“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选出了声称代表整个祖国、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大会还宣布“必须竭尽全力，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使其免受任何侵犯。”^⑤ 1920 年 1 月 28 日，伊斯坦布

① [英国] 休·希顿-沃森著：《民族与国家——对民族主义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 页。

② Ana Maria Alonso, “The Politics of Space, Time and Substance: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3, 1994, p. 384.

③ June Starr, *Law as Metaphor: From Islamic Courts to the Palace of Justi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190.

④ 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06 页。

⑤ [苏联] 安·菲·米列尔著：《土耳其现代简明史》，朱贵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年版，第 163 页。

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接受了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大会的原则和决议，发布《国民公约》，宣布领土完整、领海安全、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内政和外交自主的民族主义纲领。《国民公约》成为鼓舞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进军号角，^① 被视为土耳其的独立宣言，也是土耳其人领土认同的基础，这说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开始放弃根深蒂固的帝国愿景，将多种族的土耳其国民与领土联系起来，^② 并通过外交会议形成的声明、条约、协议^③将其具体化。8月10日，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了《色佛尔条约》，这成为土耳其领土民族国家化的转折点。《色佛尔条约》有关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规定表明，协约国政府不仅要夺取帝国大片领土，而且还要将安纳托利亚领土划分给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希腊人，这坚定了凯末尔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过，凯末尔捍卫的领土范围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疆土，而是要回到土耳其民族所能接受的合理的限度，因为他看到重新征服阿拉伯人土地和巴尔干半岛超出自身能力。尽管他在民族独立运动期间曾试图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但从未认真考虑过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诸如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汉志）纳入新生的共和国。^④ 因此，《色佛尔条约》强化了民族主义者对领土界限的认识和放弃对帝国领土范围的幻想。1921年12月1日，凯末尔发表声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我们没有为大伊斯兰主义效劳……我们也没有为大都兰主义效劳。”^⑤ 这为土耳其设

① 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207页。

② Guntram H. Herb and David H. Kaplan,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p. 298.

③ 声明、条约和协议主要包括：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民族抵抗组织代表大会通过的《西瓦斯宣言》（The Sivas Declarat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natolian and Rumelian National Resistance Organizations）（1919年10月4日）、最后一届奥斯曼议会的《国民公约》（The National Pact of the last Ottoman Parliament）（1920年1月28日）、《色佛尔条约》（The Sèvres Treaty）（1920年8月10日）、与苏联和高加索共和国的《莫斯科和卡尔斯条约》（The Moscow and Kars Treaties）（1921年3月16日和1921年10月13日）、与法国政府的《安卡拉协议》（The Ankara Agreement）（1921年10月20日）、《伦敦联合政府会议》（The London Conference with the Allied governments）（1921年2月21日~3月12日），以及《洛桑会议和和平条约》（The Lausanne Conference and the Peace Treaty）（1923年7月24日）。

④ Erik - Jan Zürcher, "The Ottoman legacy of the Kemalist Republic", in Touraj Atabaki ed., *The State and the Subaltern: Modernization,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urkey and Iran*,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p. 97.

⑤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2页。

定了领土疆界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节节胜利、苏维埃俄国对凯末尔的支持以及与协约国的利益争夺,《色佛尔条约》被废止。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政府发出邀请,重新召开会议商讨领土等问题,这促使凯末尔决心废除苏丹制。1922 年 11 月 1 日,大国民议会宣布苏丹制自两年前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之日起即不存在;11 月 7 日,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登上英国军舰出逃,奥斯曼帝国成为历史。民族意识和疆域领土成为凯末尔主义者建构新生国家的思想和空间基础。

洛桑会议期间,土耳其代表团最初坚持边界从地中海沿岸伊斯肯德伦区,沿幼发拉底河然后到伊朗边境,包括摩苏尔省等地,未得到协约国认可。凯末尔政府最后放弃了部分领土要求,因为“这些地区——西色雷斯、摩苏尔和哈塔伊省——可能会破坏新政治共同体理想化的宗教文化同质性”^①。显然,凯末尔政府着力保持安纳托利亚的领土完整,并在边界内实现最大程度的宗教文化同质性。1923 年 7 月 24 日,《洛桑和约》正式签订。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宣称:“《洛桑和约》创造了一个同质统一的家园;其中拥有免于外国人强加的义务和在国内建立国家自然特权的自由;免于强加的财政义务的自由;拥有公认的、绝对自卫权的自由和富裕的家园。”^②《洛桑和约》使土耳其的领土、国家和政治边界获得国际承认。10 月 13 日,土耳其定都安卡拉,“安卡拉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的首都,是共和国精英们雄心壮志的象征,表达了他们在一个颓废帝国的历史废墟上创造新文化和文明的愿望。”^③10 月 29 日,大国民议会选举凯末尔为总统,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由此,土耳其第一次形成了确定的边界(包括物质和伦理),即确立以领土完整为基础的政治统一的最高政治目标^④,遂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活动场域。“民族主义原则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它强调在土耳其社会中,把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人民团结的一个

^① Stanford Shaw,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Vol. 3, 1918 - 1923, A Documentary Study*,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 2000, p. 1963.

^② Salahi Ramsdan Sonyel, *Turkish Diplomacy: 1918 - 192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 25.

^③ [美国] 弗罗兹·艾哈迈德著:《现代土耳其的形成》,郑东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 121 页。

^④ Ahmet içduygu and Özlem Kaygusuz,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by Drawing Border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6, November 2004, p. 27.

重要纽带，从国家内部团结和凝聚力这方面来看，民族主义日益具有取代伊斯兰教塑造新的国民认同功能。”^①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与周边国家仍存在边界领土争端，但随着民族国家构建推进而得以解决。^②

领土是民族国家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国家提供了边界和栖息地。民族国家通过领土的叙述和意象，向基于地域界定的民族成员灌输一种对某一领土的认同感，称之为空间社会化过程，可谓领土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领土对现代国家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至关重要，这不仅反映在具体的国家边界上，也体现在领土作为民族身份形成和构建的基础上。^③ 新生民族国家寻求控制自己的领土，所以说凯末尔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种族连接力量，将多种族的土耳其国民与领土联系起来，^④ 这构成国族认同的基础。领土认同是以制度认同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前提，是人们从抽象的制度认同转变为对特定的制度实践的必要因素。“诉诸民族认同也是形成或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的传统路径之一。这一路径中典型的举措是民族建构，目的是将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建构成同一个民族的成员。这些举措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具体体现。”^⑤ 由此来看，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疆域范围内，通过民族国家构建来塑造领土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 基于公民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身份可以界定为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所拥有的、在特定的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和义务的被动和主动的身份。”^⑥ 公民身份确立与民族国家构建密切相关。克里斯蒂安·乔帕克（Christian Joppke）指出：“公民身

① 笕涛著：《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54页。

② 土耳其的边界争端主要是东部的摩苏尔周围地区和地中海的伊斯肯德伦周围地区。1926年，国际联盟的仲裁将摩苏尔省给以伊拉克；1939年，土耳其夺回了伊斯肯德伦区（或哈塔伊），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③ [法国] 吉尔·德拉诺瓦等著：《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5~66页。

④ Guntram H. Herb and David H. Kaplan eds.,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p. 298.

⑤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第60页。

⑥ [英国] 恩勒·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份意味着现代国家并非作为一个地域组织，而是一个成员联合体……如果说主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民主的）国家属性相连，那么公民身份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的）民族属性相连。”^① 诸多民族国家通过宪法确认统一的公民身份^②，为构建国族认同提供必要保障，所以国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宪法保障、制度包容。以宪法性质的权利法案为路径构建国族，实际上就是通过同质的公民身份、平等的政治参与以及坚实的权利保障，促使不分族群的民众结合成政治共同体即国族。^③ 在一个族群和文化多元的国家里，“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记忆和文化差异的民族集团，作为平等的社会行为主体，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和法律地位，与其他的民族集团共存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共同体化’”。^④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公民民族主义构成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道德和政治纽带，从而造成公民对现有社会制度和政治规则的同意或服从。公民民族主义往往是将多个族群纳入民族共同体中，以公民—国家的政治、法律纽带将之建构为一个民族，但由于民族建构也包含语言、文化、历史、经济等纽带，所以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土耳其的公民民族主义可以回溯至晚期奥斯曼帝国。帝国统治者通过颁布坦齐马特改革法令和 1876 年宪法，来强化奥斯曼人的公民意识，进而改变帝国的合法性基础。1876 年宪法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一个包括不同宗教团体和“民族”的奥斯曼“国家”^⑤，所有居住在帝国内的臣民都是奥斯曼人。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纳米克·凯末尔（Namık Kemal）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领土和宪法意义的瓦坦或家园概念，宣称包括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在内的所有公民，

① Christian Joppke,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 –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 – 6.

② 一般来说，将公民权利载入宪法文本，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民主功能，即通过保障以选举权、被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参与，巩固民主政治机制。二是公民身份功能，即通过宪法权利的体系结构从而确认民众平等且同质的公民身份。三是权利保障功能，即通过承认并保障各种权利，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自由、发展与幸福。参见李亢：《宪法权利与国族构建：加拿大的经验与教训》，载《世界民族》2022 年第 1 期，第 37 页。

③ 李亢：《宪法权利与国族构建：加拿大的经验与教训》，第 43 页。

④ 王建娥著：《包容与凝聚：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固的制度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2 页。

⑤ Yeşim Bayar, *Formation of the Turkish Nation – state, 1920 – 193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1.

都将通过民主选举的议会表达共同意愿。^① 尽管纳米克·凯末尔积极激发民众对祖国的绝对忠诚，但并没有结合帝国实际阐明祖国的内涵。

1920年3月16日，当英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时，奥斯曼帝国政府解散议会，穆斯塔法·凯末尔通令各省在安卡拉召开议会。4月23日，大国民议会（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在安卡拉成立，由新当选或逃离伊斯坦布尔的议会代表组成。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组织法》（The Law on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首次采用国家主权原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② 《基本组织法》使安纳托利亚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伊斯坦布尔被占领期间发挥领导作用，但其与尚未废除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并存。与此同时，土耳其人的公民身份受到西方影响。10月20日，土耳其与法国签署《安卡拉协定》（The Ankara Agreement），第七条规定土耳其语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尽管大多数公民是奥斯曼阿拉伯人、库尔德少数民族，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将得益于文化少数民族权利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和语言。通过这种方式，安卡拉政府将其公民的种族起源描述为土耳其人。^③ 在洛桑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将公民身份规定为一种统一的、世俗的、公民—领土的、包容性身份，其基础是所有公民在法律和权利义务方面的完全平等，但断然拒绝了根据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国际标准对少数民族的定义，以消灭和同化生活在新土耳其边界内的各种不同因素。^④ 最终签署的《洛桑和约》是土耳其处理国家地位和希土问题的国际性公约，有关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条款赋予其宗教自由和法律平等地位，并间接提及所有公民的权利和普遍的公民身份。^⑤ 土耳其民族主义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基于公民权利的政治实体认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要尽可能地

① Şerif Mardin, *The Genesis of Young Ottoman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28.

② [英国]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③ Ahmet içduygu and Özlem Kaygusuz,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by Drawing Border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Turkey”, p. 39.

④ Ibid., p. 41.

⑤ Sule Toktas and Bulent Aras, “The EU and Minority Rights in Turke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4, Winter 2009/2010, p. 700.

国民对各自族体的认同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这是国民成为现代公民的先决条件，也是所有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颁布宪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明确每个人都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形成民众参与选举的代议制度、组织行政和司法体系。1924 年 4 月，大国民议会出台宪法，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我们不可能赋予他们基于种族属性的权利”^②。宪法第 88 条规定：土耳其居民不论其宗教和种族，在公民身份方面均被视为土耳其人。具体而言，土耳其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出生于土耳其境内外，但其父是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出生或在成年时选择成为土耳其人，但其父是定居在土耳其的外国人；根据《公民法》被认定为土耳其人。^③ 根据该条款，所有公民不论其宗教或种族背景，都被视为土耳其人。“1924 年宪法，一方面是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蓝图的设想，是对传统社会进行改造的宣言；另一方面意蕴则是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非土耳其族裔属性且块头较大的族裔进行改造的号角。”^④ 现代宪法旨在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1924 年宪法通过确认土耳其统一的公民身份，为建国族认同提供了必要前提。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能够巩固政治机制，确保不分族群的公民共同参政议政，从而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维护，使得权利保障成为国族构建的正当性基础。

凯末尔主义者将土耳其境内的多个族群，通过人民主权、国家价值与制度建设等宪法原则捆绑在一起，但土耳其人的语言、文化纽带则植根于深远的历史传统。“如何处理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地区性民族差异，将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民族整合到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并使所有民族的成员都由衷地认同于国家，服膺于国家的政治秩序，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成为现代国家强本固基、

① 宁骚著：《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05 页。

② Mesut Yegen, “Prospective – Turks’ or Pseudo – Citizens’: Kurds in Turke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3, No. 4, 2009, p. 599.

③ Cited in Yeşim Bayar, *Formation of the Turkish Nation – state, 1920 – 1938*, p. 128.

④ 李秉忠著：《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80 页。

维护存在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它制度建构的内驱动力。”^① 公民民族主义推动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实际上是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同步构建的过程，相当一部分国家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体系，但未能实现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与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从而导致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冲突和对抗。

三 基于语言文字统一的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动力在于用一套共享的符号、神话、记忆，在民族领土范围内将公民共同体团结起来，并将其融合在一种可以认同的文化共同体中。”^② 统一语言、文字和历史记忆是构建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内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来，无论从提高政府运行效率考虑，还是从经济活动的交流语言考虑，各国政府都倾向于采取多种方式在辖区内推行一种共同语言和文字……各国政府出于政治整合和行政效率的考量，全力推行一种通用语，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在当今许多国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已被全社会公认为国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③ 现代国家对其领土上的人民进行文化整合，“探索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道路的民族主义”^④。对于土耳其而言，主要通过统一语言文字来建构国族认同的文化基础，以塑造其政治合法性。

第一，凯末尔政府通过推行语言改革和统一国语的运动来塑造民众的民族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指出，形成民族意识的最重要步骤是改变语言的性质，创造一种可以逐渐普及的统一交际语言。^⑤ “由于语言被普遍视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文化认同基础，因此，确立国家通用语言、在公共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推行国家语言文字，被各国政府视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国家统一的主要措施之一。”^⑥ 土耳其人统

① 王建娥著：《包容与凝聚：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固的制度机制》，第13~14页。

② [英国] 安东尼·D. 史密斯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

③ 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第128页。

④ 郭洪纪著：《文化民族主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地区），1997年版，第5~6页。

⑤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57.

⑥ 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第127页。

一语言的尝试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19 世纪后半叶，奥默尔·塞佛丁（Ömer Seyfeddin）、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等知识分子试图以安纳托利亚方言为基础，创造一种不同于奥斯曼语^①的“新语言”。在青年土耳其党时期，“新语言”获得官方支持而逐渐成为法律和行政语言，并在报纸和文学作品中使用。^②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主义者将奥斯曼语视为外来力量影响的表现，希望用一种服务新一代土耳其人的语言取而代之。^③ 语言改革成为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语言乃是民族灵魂所在，而且，就像我们即将会看到的，语言在日后更成为决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④ 统一语言是凯末尔主义者用来创建民族的主要手段。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族群和语言异质化问题仍很突出。凯末尔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国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语言。一个归属于土耳其民族的人，应该主要说土耳其语。换言之，一个土耳其人不会说土耳其语，无论他声称对土耳其文化和社团多么忠诚，都令人难以置信。”^⑤ 犹太裔土耳其知识分子阿夫拉姆·加兰蒂（Avram Galanti）也指出，“那些生活在土耳其、不用土耳其语交流的人……可以从文字、名字和官方意义层面被认为土耳其人。然而，他们的灵魂、思想和心灵不可能是土耳其人。”^⑥ 有鉴于此，凯末尔政府开始限制使用其他语言。1927 年，格克切阿达（Gökçeada）和博兹加阿达（Bozcaada）的少数民族学校禁止使用希腊语授课。政府要求在外国学校和少

① 奥斯曼语（Osmanlıca）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下的合成混合产物，其语法和词汇主要来自外来借词和结构，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奥斯曼帝国官方的精英阶层。See Charles F. Gallagher, “Language Reform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urkey”, in Joan Rubin and Björn H. Jernudd ed.,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1, p. 153.

② Uriel Heyd, *Language Reform in Modern Turkey*, Jerusalem: The Israel Oriental Society, 1954, p. 18.

③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6, 2004, p. 68.

④ [英国]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92 页。

⑤ Baskın Oran, *Atatürk Milliyetçiliği*, Ankara: Bilgi Yayınevi, 1993, p. 203, cited in Ayşegül Aydıngün and İsmail Aydıngü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urkishnes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2004, p. 423.

⑥ Cited in Yerim Bayar,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 – building through Language Policies the Case of Turkey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1920 – 38)”,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7, No. 1, 2011, p. 115.

数民族学校工作的教师以土耳其语为母语。^① 1928年1月14日，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院学生协会（The Law Faculty Students' Association）发起了“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学生们宣布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共场所张贴标志，提醒人们在公共场合说土耳其语，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波斯尼亚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族群在公共场合说其他语言遭阻挠。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土耳其西海岸和西色雷斯的城市，报纸上充斥使用非土耳其语引发冲突的报道。据里法特·巴里（Rifat Bali）所言，在运动期间，除了用土耳其语交流，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带来言语骚扰甚至身体攻击的风险。^② 一些犹太社团通过设立土耳其语课程或成立委员会来鼓励犹太人说土耳其语。但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所言，这场运动的特点及其目标证实了语言可以在“捆绑精英物质利益与大众利益”方面具有强大功能。^③ 不过，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吉亚斯·伊沙克（Gıyas İshak）指出，土耳其化应该通过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来传播，而不是高喊“公民，请说土耳其语！”或者从人们手中夺走外国报纸。^④ 最终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反对下，这场运动告一段落。1935年，伊诺努总理呼吁公民说土耳其语：“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所有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公民都会说土耳其语。”^⑤ 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Turkish Students）随后发起了一项公众只说土耳其语的活动。1936年2月26日，布尔萨（Bursa）和吕布尔加兹（Lüleburgaz）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土耳其语以外的语言。上述行动体现了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采纳主流语言的冒进做法，但也说明语言统一作为构建国族认同的基础被凯末尔主义者所认可。

第二，凯末尔政府通过采用拉丁字母来建立强化民族认同的载体。晚期奥斯曼帝国改革凸显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奥斯曼语的诸多问题。19世纪末以

① Yerim Bayar,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 – building through Language Policies the Case of Turkey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1920 – 38)”, p. 115.

② Senem Aslan, “ ‘Citizen, Speak Turkish!’: A Nation in the Mak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3, 2007, p. 254.

③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22.

④ Senem Aslan, “ ‘Citizen, Speak Turkish!’: A Nation in the Making”, p. 263.

⑤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3, May 2004, p. 96.

来，奥斯曼帝国的语言简化尝试带来改革字母文字的探索。^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字母改革的争论仍在继续。以卡齐姆·卡拉贝克尔（Kazım Karabekir）为代表的一批人，将阿拉伯字母视为土耳其人及其穆斯林兄弟团结的象征，字母改革只需对文字进行修订，而不是完全替换。以侯赛因·加希特（Hussein Cahit）和克勒奇扎德·哈克（Kılıçzade Hakkı）为代表的另一批人认为，拉丁字母化是土耳其摆脱奥斯曼帝国负累的必要条件。^② 1928年5月，凯末尔政府成立了语言委员会（The Language Committee），负责字母“拉丁化”和制定新语法的工作。随后，语言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字母改革的报告，并于8月1日提交给凯末尔总统。8月9日，凯末尔根据这份报告推出以拉丁字母为蓝本的“新土耳其字母”。^③ 随之，土耳其相关部门面向高级官员、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举办了专门课程班，教授他们使用新字母。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字母的法律，凯末尔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字母教育运动。

采用拉丁字母无疑更适合土耳其语的音韵，也为此后民众识字率飙升铺平了道路。^④ 政府不仅通过这种文字媒介提高了民众识字率，而且读写能力的普及缩小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一旦建立起沟通渠道，民众就会受到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逐步接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变化也给官方提供控制作品出版的机会。另外，政府通过采用拉丁字母来割断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减少了反对者援引旧例阻止改革的可能性。正如穆斯塔法·谢基普（Mustafa Şekip）所言，“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些反对意见，它们不断向我们指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头脑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和未

① 1908年，米拉斯利·伊斯梅尔·哈克（Milâslı İsmail Hakkı）用3个阿拉伯元音的修改形式来代表8个土耳其元音的字母系统，但更为繁琐导致操作性不强。1912年，泰比耶基·伊斯梅尔·哈克（Terbiyecisi İsmail Hakkı）和吉汉吉利·希纳西（Cihangirli M. Şinasi）设计了一个字母系统，并添加新字符来代表元音，形成可以代表所有土耳其语的字母表，但由于对阿拉伯语字母的修改过多而几乎无法识别。1913年，陆军部长恩维尔发起新字母方案，意在简化军事电报员的工作，后来扩展到部委内部的官方信函。在战争期间尝试这样的改变显然时机不对。1917年，恩维尔出版一本被称为《埃利夫巴》（Elifba）的读物来教授其字母。随着一战结束，恩维尔的字母方案试验被终止。此时，部分记者和文学家敦促采用拉丁字母。1914年春，由克勒奇扎德·哈克出版的周刊发表了5篇未署名的系列文章，宣传采用拉丁字母，并预言变革必将到来。

②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p. 70–71.

③ Ibid., p. 72.

④ Hale Yılmaz, “The Social Experiences of Turkey’s 1928 Alphabet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3, No. 4, 2011, pp. 678–679.

来。让那些喜欢过去的人留在过去”。^① 奥斯曼帝国与共和国的文字书写不同，使土耳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国内的所有民族主义话语，从而向民众呈现出单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② 哈立德·艾迪普（Halide Edip）指出，字母变化是“向最终心理上统一于西方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而这似乎是土耳其的命运。”^③ 随后，凯末尔政府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字母。次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从学生课程表中被删除，民族主义思想通过使用拉丁字母发表的杂志和文章获得进一步宣传，那些不使用拉丁字母的杂志和期刊因缺乏国家支持而逐渐关闭。字母改革促使土耳其得以建立一个由新一代公民组成的行政和社会阶层，使国家领土趋于统一，并在公民中灌输新的土耳其民族性的理想。^④ 由此，埃尔津詹议员法济尔·艾赫迈特贝伊（Fazil Ahmet Bey）慨言：“不要认为字母改革仅仅是促进读写的措施，科学的书写方法已如此先进，这已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它的主要益处是让我们不再迷信我们的道德。”^⑤ 采用拉丁字母后，凯末尔政府使土耳其人从波斯—阿拉伯奥斯曼遗产中获得文化独立，字母改革事实上成为塑造其国族认同的重要举措。

第三，凯末尔政府通过语言净化运动和“太阳语言理论”来巩固凯末尔民族主义的成果。“语言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在追求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语言可以用来界定种族差异；民族独立之后，语言加以推广则可以形成民族主义所需的全国性交际共同体。”^⑥ 1928年，土耳其实施字母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著述强调语言是构建民族主义的核心。凯末尔指出，“丰富的民族语言对民众深化民族感情有巨大作用。土耳其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豪感的塑造，必须把自己的语言从外来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⑦ 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

①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p. 72–73.

② Shayan Salehi, “Building a N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urkish Language Reforms of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Turkish Nation State”, *NMC Journal*, Issue VII, 2020, pp. 60–61.

③ Zana Çitak,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France and Turkey*, Ph. D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2004, p. 243.

④ Shayan Salehi, “Building a N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urkish Language Reforms of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Turkish Nation State”, p. 62.

⑤ Zana Çitak,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France and Turkey*, p. 242.

⑥ [英国] 苏·赖特著：《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9页。

⑦ Cited in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77.

言协会 (The Turkish Language Society) 成立, 其首要目标是纯化土耳其语言, 缩小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距, 使其彰显文明和科学性。为实现上述目标, 土耳其语言协会制定了如下程序: 组织科学会议; 编纂土耳其语词汇; 尽可能搜集所有文献资料, 研究土耳其语, 并从旧书和不同地方方言中丰富新词语料库; 出版土耳其语言协会的知识产品。^① 同年 9 月 26 日, 第一届土耳其语言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此次会议传递出关于土耳其语的多重信息, 如土耳其语是最早也是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很可能是苏美尔人和赫梯人的语言, 是构成现代语言学基础的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 其语言传播范围已从中亚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芬兰海湾。^② 大会选举出中央语言委员会, 指导语言协会的工作和活动, 并颁布了一项加快语言改革、推广新土耳其语^③的方案。1932 年 11 月, 凯末尔政府发布一项法令, 要求所有行政机构合作收集存在于日常交流中的土耳其语词汇, 这些词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于书面语言,^④ 在各省成立由地方高级官员和共和人民党领导人组成的分支语言委员会, 委派教师和其他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从事词汇收集工作。与此同时, 学者对 159 种以土耳其方言为主的古老文献和词典进行研究, 以发现新土耳其语词汇。此外, 政府还开展了针对识字者的语言调查, 目的是找到与新土耳其语对应的词汇, 以取代 1 400 个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 最终从日常和过去使用语言中收集了大约 13 万个单词。^⑤ 1934 年夏天, 这些材料被编入《土耳其奥斯曼语词汇对应集》(A Collection of Turkish Equivalents for Osmanlıca Words), 用大约 3 万个新土耳其语词汇替代 7 000 多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外来词汇。^⑥ 不仅如此, 相关人员还收集了法语、英语或德语的科学技术

①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76.

② Ruşen Eşref Üneydin, *Türk Dili Tetkik Cemiyeti'nin Kuruluşundan İlk Kurultaya Kadar Hatıralar* (Memoir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Research Society to the first Congress), 2nd edition, Ankara: TDK, 1943, pp. 76 - 77. Cited in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77.

③ 新土耳其语是一种摆脱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只包含源自土耳其语词汇的语言, 其词汇来源有二: 一是从普通人的词汇、古代土耳其词汇和其他突厥语族的旧文本中收集词汇, 二是搜索土耳其语中与外来词的对应词。See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79.

④ Uriel Heyd, *Language Reform in Modern Turkey*, p. 26.

⑤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80.

⑥ Ibid.

语，分发给专家以便他们提出土耳其语的对应词。据此，学者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从土耳其语中清除，包括一些已经在土耳其语中存在千年的词汇。^①

新土耳其语通过官方得以推广，凯末尔使用新土耳其语发表演讲和写信。不过，由于已经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也被清除，再加上许多被清除的词汇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这就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亚沙尔·纳比（Yaşar Nabi）认为，“清除所有外来出身的词汇导致土耳其语过于贫瘠和不足……其中许多词汇已在人们的语言中生根发芽……取代外来词的少数新土耳其语词汇使科学技术无法取得任何进步，甚至无法创造最原始的文学作品。”^② 1935年9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袖珍词典》（*An Ottoman – Turkish Pocket Dictionary*）和《土耳其语—奥斯曼语袖珍词典》（*A Turkish – Ottoman Pocket Dictionary*）出版，不再强调为所有源自外国的单词找到土耳其语的对应词，因此词典中包含了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

从1935年底开始，语言学家酝酿提出“太阳语言理论”（Sun – Language Theory），并在第三届土耳其语言大会上公布。阿戈普·马尔塔扬（Agop Martayan）教授^③详细阐述了该“理论”的含义：“寻找这片曾是摇篮的土地上的种族和主导文化……在文化和语言方面，这个国家主导种族的物质家园是中亚，那里居住着阿尔卑斯山的短颅人——土耳其人。学者们试图将苏美尔人种族、语言和摩亨佐达罗人联系起来，中亚地区除了乌拉尔—阿尔泰语之外，还产生了阿拉伯语、大卫语（Davidian）、希腊语、德语、亚美尼亚语、印欧语、赫梯语、伊特鲁里亚语、班图语、埃及语等世界上的语言。”^④ 支持“太阳语言理论”的学者认为，土耳其语“是世界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语

^① 1935年5月，土耳其语言协会出版了一本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口袋指南》（*Ottoman – Turkish Pocket Guide*）的词典，列出了各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单词的替代品。例如，来自阿拉伯语的“sulh”（和平）、“harb”（战争）和“milli”（国家），分别被改为“barış”“savaş”和“ulusal”；来自波斯语的“germ”（热的）、“efsun”（魔法）则被“sıcak”和“büyü”所取代。

^②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83.

^③ 阿塔图尔克根据《姓氏法》所有公民都要使用土耳其姓氏，给马尔塔扬教授一个纯土耳其姓氏“Dilaçar”，代替他的亚美尼亚名字，新姓氏在土耳其语中是“舌头或语言开启者”，这表明了他在语言纯化运动中的作用。See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p. 92.

^④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p. 92.

言，因此是梵语（Sanskrit）、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根”，^① 这构成当时土耳其语言学的基础。如果土耳其语是所有语言的基础，就没有必要清除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来自欧洲的词汇，这就大大增强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心。凯末尔在演讲中也重新使用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如用“millet”取代了此前使用的“ulus”。^② 尽管“太阳语言理论”并非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但对于塑造民族意识至关重要，凯末尔主义精英确立现代土耳其人和古代安纳托利亚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从而为其领土主张提供了历史合法性。“通过改革土耳其语，共和国精英们创造了一种新媒介。通过这个媒介，他们可以巩固土耳其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古代突厥和安纳托利亚人的神话，从而提供了国家的历史合法性。”^③ 土耳其国家民族意识的建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语改革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通过将土耳其语作为一种独立甚至更高级语言的推广，使土耳其在世界民族之间获得独立地位。随着简化的、真正的土耳其语得以巩固，公民思想将根据共和人民党的原则被重塑。^④ 凯末尔政府通过字母语言改革来巩固民族认同和主权独立，因为“文字革命，以及后来的语言净化尝试，都是建立在多重政治目标的基础上的，即通过重新命名或定义来打破过去、解释现在和重塑未来。”^⑤ 它对于塑造同质化国族认同的意义可见一斑。

四 基于同质化民族而构筑的族群民族主义

“历史地看，所有的民族以及它们的民族主义在根子上都是‘族群的’。而且尽管有时候民族可能超越原有的族群，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共同体中与其他族群合并，但是它依然从对其独特的祖先和历史的信念中获得动员的力量。”^⑥ 族群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拥有共同祖先的神话以及祖先故土的继承为

①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77.

② Ibid., p. 85.

③ Shayan Salehi, “Building a N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urkish Language Reforms of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Turkish Nation State”, p. 62.

④ Yerim Bayar,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 – building through Language Policies the case of Turkey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1920 – 38)”, p. 119.

⑤ Yılmaz Çolak,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p. 84.

⑥ [英国]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 111 页。

根据的情结，通常以血缘关系、集体记忆和目标、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归属于特定地域为依据，着力把一些族群组织动员起来开展民族运动，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权利而斗争。一般而言，族群民族主义者所认同的文化是族群共同体经过人为选择、加工，抑或虚构的产物，并非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往往具有工具主义特征。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努力用土耳其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淡化甚至消除多元族群的文化、历史记忆，以期把土耳其人变成一个“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有自己纯洁民族语言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民族”。^①“这个共同体新的、核心的社会纽带——现在被称为土耳其民族——将在种族基础上形成。以这种方式想象构建的土耳其民族，被深深地植根于历史、语言、地理、人类学和生物学（血统）中，它们以世俗而非宗教的方式实现民族概念固定化。”^②

第一，通过强调民众的语言文化历史认同感，强化不同族群国族认同的社会基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人口构成和宗教信仰仍呈现出多元化特征。^③凯末尔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消除民众在语言、文化、宗教和族群身份上的差异，以打造一个同质化的语言共同体。“民族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政治化，即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贯彻以文化为内容的道德义务。国家首先会产生对国族的基本设想，这个民族可能是以一个或几个族群为原型，也可能是基于文化想象。然后，国家会把全体公民作为要建构的民族成员对待，他们作为民族成员被认为都负有一定的义务，因而实现这种民族义务的普遍化。”^④齐亚·格卡尔普指出：“在土耳其，一些同胞的祖先来自阿尔巴尼亚或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如果他们接受过土耳其文化教育，并且树立了以土耳其国家发展而奋斗的工作目标，我们就不能把他们与其他公民区分开来。我们怎么能把那些同甘苦、共患难的人看作是外国人呢？我们又怎么能对那些做出巨大牺牲并为土耳其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人说，你们不是土

① 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211页。

② M. Asum Karaömerliog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3, 2020, p. 745.

③ 主要包括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包括非土耳其族的穆斯林，如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拉泽人、格鲁吉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波马克人、塞尔维亚穆斯林、波斯尼亚人、鞑靼人、切尔克斯人、阿布哈兹人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See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p. 87.

④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第61页。

耳其人”。^① 土耳其人身份逐渐明确，包括那些愿意接受土耳其文化和语言的犹太人也被视为土耳其人。例如，“作为一个离开西班牙、操西班牙语来到土耳其的犹太人，在当地学校学习土耳其文化教育相关课程后，就会成为土耳其人，他们与在土耳其的法国犹太人英国犹太人别无二致。”^② 这意味着任何人，不论其宗教或种族如何，都可以成为土耳其人。

基于历史观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规范历史写作和教学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被视为一项国策。凯末尔主义者以《塔里赫》历史教科书为载体，通过历史教育塑造民众的认同意识。当时，凯末尔政府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土耳其形成认同意识：一是民族认同基于土耳其历史观并强调土耳其的亚洲地域特征，同时反映共和国改革的民族主义性质；二是世俗宗教认同代表了共和国改革的当下性和西化本质；三是政治认同反映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特征。^③ “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以及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建构同质化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且促使土耳其历史观逐渐定型。由此看，凯末尔政府打造同质化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塑造国族认同的民族意识内聚化过程，这种民族意识的内聚使民族群体对外来文化产生排斥感，尤其是当另一个强势民族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对其他民族采用同质化政策时，这种排斥感会变得非常激烈，进而产生冲突和对抗。在一定时期内，冲突和对立会借助某种社会问题演变成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民族问题就形成了。^④

第二，通过对历史进化论的阐释，塑造国内不同族群的科学认知基础。从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科学被知识分子看作是连接进步和世俗主义的桥梁，进化论被视为科学的支柱，因而受到欢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基于科学的唯物主义、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凯末尔主义者的共识，进化论被视为形成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而被渗透在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生物学和人

^① Ziya Gökalp,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bert Devereux, Leiden: Brill, 1968, p. 16.

^② Şeref Gözübüyük and Z. Sezgin, *1924 Anayasası Hakkındaki Meclis Görüşmeleri*, Ankara: Ankara Ü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idari ilimler Enstitüsü, Balkanoğlu Matbaacılık, 1957, p. 438, cited in Ayşegül Aydıngün and İsmail Aydıngü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urkishness”, p. 426.

^③ Fatih Yazıcı and Tercan Yıldırım, “History Teaching as a Nation – building Tool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in Turkey (1923 – 1938)”,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 54, No. 4, 2018, pp. 445.

^④ 王伟、张伦阳：《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的库尔德问题及民主化与族群冲突探析》，载《世界民族》2019 年第 2 期，第 7 页。

类学的教材编写中。1930年出版的《土耳其历史大纲》(*General Outlines of Turkish History*)是进化论影响历史观的突出体现。^①历史教科书《塔里赫》吸纳了进化论观点,包括人猿同祖、物种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生命起源是自然结果而非超自然力量、宗教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社会产物,以及物种的进化体现适者生存原则等内容。进化论也体现在高中地理教科书《普通地理课程 I》^②、艾赫迈特·陶菲克·格依曼(Ahmet Tefik Göymen)的《新生物学》(*Yeni Biyoloji*)和《生物学教程》(*Tabiiye Dersleri*)中。土耳其教育学奠基人伊斯梅尔·哈克·巴尔塔克哲奥鲁(Ismail Hakkı Baltacıoğlu)非常重视进化论,他关于儿童发展的著作中充满进化论的讨论,致力于整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拉马克(Lamarck)的获得性状的遗传,^③这体现了进化论对民众意识形态塑造的影响。著名政治家萨德里·马克苏迪(Sadri Maksudi)认为,生物进化应该被视为创造历史的一个因素;拉马克强调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器官的使用或废弃是其进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达尔文强调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建立了一个基于进化论的哲学。^④这些观点体现在第二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的主题中。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主席萨米·里法特(Samih Rifat)基于对语言学著作的研究,认为用进化论可证明土耳其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之一。在第一届土耳其语言大会上,学者普遍使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土耳其语是其他语言的祖先。萨米·里法特认为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土耳其语单词的痕迹。^⑤受赫伯

① 该书从天文学开始写起,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进化,最后到土耳其历史。认为生命是地球上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化学和物理过程的结果,宗教对生活的解释是源于犹太神圣传说的误解,人类历史是自然的产物,所有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See M. Asım Karaömerlioğ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p. 745 – 746.

② 该教科书由土耳其地理学科的先驱法克·萨布里·杜兰(Faik Sabri Duran)主持编写,他对“为生存而斗争”“适者生存”、灭绝现象的强调,以及对人猿同祖的审视,都渗透在本书中。

③ Ismail Hakkı and içtimai Mektep, *Istanbul; Semih Lütfü Sühulet Kütüphanesi*, 1932, pp. 40 – 41, cited in M. Asım Karaömerlioğ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p. 752 – 753.

④ Sadri Maksudi, *Tarihin Amülleri. In Birinci Türk Tarih Kongresi*, Ankara: Maarif Vekaleti, 1932, p. 351, cited in M. Asım Karaömerlioğ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 746.

⑤ Samih Rifat (Yalınzgil), *Türkçe’de Tasrif – i Hurûf Kanunları ve Tekellümün Menşe’ I*, Ankara: Matbuat ve istihbarat Matbaası, 1922, p. 4, cited in M. Asım Karaömerlioğ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 748.

特·斯宾塞影响的知识分子艾赫迈特·艾默尔 (Ahmet Cevat Emre) 进一步认为, 土耳其语属于印欧语系。^① 随着“太阳语言理论”的出炉, 凯末尔政权在安卡拉建立语言、历史和地理学院, 开设有关“太阳语言理论”的必修课程。可以说, 凯末尔主义者以进化论来指导民众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世界观, 试图在进化框架内形成土耳其民族主义, 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于历史事实的扭曲。

20 世纪 30 年代初, 随着考古遗址和化石遗迹数据的积累, 土耳其人类学家开始从进化论的视角来解释新发现, 试图证明土耳其人属于高加索阿尔卑斯人种, 因为他们的头骨结构是短颅型的。这种头骨结构的定位扭转了“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土耳其人的野蛮形象, 证明土耳其人也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通过人类学研究, 学者们追溯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根源和成就, 使塑造国家神话成为可能。^② 阿菲特·伊南 (Afet Inan) 的研究为此提供佐证, 她曾测量了 6.4 万个头骨, 指出对这些发掘骨骼的研究证明了当代土耳其人和安纳托利亚最早居民之间的血缘关系, 称赞安纳托利亚“种族特征一直保留着土耳其的核心”。^③ 尤涅·皮塔德 (Eugène Pittard) 指出, 尽管安纳托利亚一直被许多不同定居者入侵,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人仍属于原来的土耳其种族。因此, “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拉兹人和其他人, 主要是圆颅人”, 都来自“同一个最初的、原始的群体”。^④ 第二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的结论是: 安纳托利亚自古以来就有土耳其种族基因, 过去的所有居民都是这个种族成员, 这就为土耳其构建跨越族群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人类学证据。

土耳其为我们理解进化论思想在民族主义形成中的作用提供了鲜明例证。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等学者强调的那样,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生存主义框架内被使用和滥用, 以使一个基因群体相对于其他基因群体的“自然”优越性合法化。^⑤ 凯末尔主义者对进化论的使用, 更多是出于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

① T. F. Ertan, *Ahmet Cevat Emre ve Kemalizm'de Öncü bir Dergi: Muhit*, Kebikeç, 5, 1997, p. 18, cited in M. Asım Karaömerliog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 749.

② M. Asım Karaömerlioglu and Murat Yolun,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1923 – 1938)”, p. 750.

③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p. 93.

④ Ibid.

⑤ Ernest Gellner,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4, pp. 27 – 28.

代捍卫土耳其人的生存权利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西方国家发明的进化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武器，以抵御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对新生民族国家的偏见。显然，族群民族主义提供了基于血缘、族裔、情感或文化凝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力图构建国族认同的科学基础，进而在领土性制度安排中发挥强化凝聚力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削足适履的倾向。

五 余论

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整合东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尝试，呈现多元性、融合性、工具性甚至矛盾性特征。一方面，凯末尔民族主义体现了土耳其融入西方世界追求与保持民族特性的对立统一。“阿塔图尔克的基本理想是一个伟大的、被解放的土耳其，它甚至比当代文明更发达，它要成为一个按照西方标准生活的国家，是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 所以，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前期更多强调民族主义的领土和主权特征。随着同质化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凯末尔政府越来越多地诉诸强调土耳其族群和语言偏好的政策。土耳其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的最初公民或领土概念受到侵蚀。”^② 公民与族群的相互拒斥使得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伴随着融入西方和捍卫主权的博弈，凸显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凯末尔民族主义着力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统一，强化了土耳其人的国族认同意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伴随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和调适。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借助民族认同中的传统因素来实现国家建设。就土耳其而言，凯末尔政权通过整合民族、历史、语言、种族、文化因素而形成民族认同，民众对土耳其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认同意识逐渐强化。“如同许多成功的民族国家一样，土耳其也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以国家塑造或锻造民族，再以民族认同国家并继而完成国家认同是土耳其构建民族国家及其认同的重要途径。”^③

^① Kemal H.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 326.

^② Kemal Kirişçi, “Disaggregating Turkish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Practic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33, 2000, p. 1.

^③ 周少青、和红梅：《土耳其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困境》，载《学术界》2022年第4期，第206页。

所以说，基于国族认同的土耳其民族共同体迄今仍在形成过程中。作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范式和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民族主义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第一，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公民和族群倾向未能实现协调发展，使得民族问题作为民族国家构建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附属产品而出现。土耳其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整合模式导致公民、族群共同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复杂化，形成基于领土和公民权利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基于语言文化认同和族裔身份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分野。公民民族主义以公民—国家的政治、法律纽带将之建构为一个民族，所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 3 部宪法无一例外地强调，所有土耳其人，不分民族、出身和宗教信仰都是土耳其公民，这说明宪法能够通过确认统一的公民身份为构建国族认同提供必要前提。但官方的宪法规定与具体实践存在差距，并非赋予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自由。“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体现的是一种强迫文化同化政策；20 世纪 40 年代的财产税给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带来的是民族歧视和区别对待；二战期间的军队保护区事件（The Incident of Reserves）更是对公民权的肆意践踏。另外，尽管法律赋予非穆斯林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权，但除了为数不多的非穆斯林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外，他们参与公共权力机构的渠道和晋升空间被限制，这说明公民民族主义对于构建国族认同作用的有限性。而且，凯末尔政权在一体化民族聚合过程中，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消除民众在语言、文化、宗教和族群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由于采取了刚性极强的民族主义建国方案，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一开始便不甚平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性和传统与均质化的民族国家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数量众多、文化语言特性比较突出的库尔德人，更是成为均质化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中最大的‘问题群体’。”^① 在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民族国家构建实际上是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同步构建的过程，由于未能较好地整合各族群，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对现行民族国家秩序构成挑战，其引发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是难以摆脱的梦魇，甚至弱化了少数族群的国族认同意识。“真正统一的国族应当是国内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可能是‘你完全变成我’；真正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国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缔

^① 周少青：《土耳其民族问题析论》，载《学术界》2019 年第 8 期，第 171 页。

造，共同拥有的国家。”^①所以说，对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必须超越西方意义的从族群—文化性的“部族国家”走向政治—法律性的“公民国家”演进框架，以在公民平等与族际差异之间达成协调与平衡。族群平等与文化融合是当今世界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模式，构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诸多国家破解民族问题的终极方案。

第二，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四重向度相互纠合和交织，使得土耳其身份认同与外交政策相关联，并为新奥斯曼主义获得发展空间。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土耳其认同的解读，既有认为它本质上是西方国家或伊斯兰国家，也有认为它是一个“枢纽国家”^②或“四分五裂的国家”^③，这体现了对其身份认同的分歧。土耳其身份认同的差异使其经历了从加入西方阵营向坚持东西方平衡的外交定位的转变。众所周知，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在杜鲁门主义的影响下加入北约，成为冷战期间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并积极谋求加入欧盟。欧洲对土耳其的排斥导致土耳其国内关于身份认同的辩论和向中东地区国家倾斜。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的角色很有可能超越当前的固有形象而变得更为独立和坚定……从西方立场来看，土耳其将会变成一个更为积极、更有能力且在许多方面更为独立的盟友。^④与此同时，伊斯兰、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库尔德和突厥人的政治认同在土耳其国家—社会关系图谱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的奥斯曼—伊斯兰起源在调节、塑造国家政策和社会对自我的认知方面变得更加自主和有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奥斯曼或土耳其认同意识——新奥斯曼主义：呼吁重新表达土耳其民族主义，并像奥斯曼帝国过去那样，增加对多样性的政治和文化宽容；消除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尊重邻国的政治边界。新奥斯曼主义并非旨在消除国家边界，也不是寻求复活奥斯曼帝国，而是在拥有奥斯曼伊斯兰遗产的口中创造一种新的宏观认同感。^⑤这说明新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建立一

① 宁骚著：《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第351页。

② See Robert S. Chose, Emily B. Hill and Paul Kennedy, “Pivotal States and US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1995, pp. 33–51.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 42.

④ Ian O. Lesser, “Turkey in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1, Fall 2000, p. 184.

⑤ M. Hakan Yavuz, “Turkish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Flux: The Rise of Neo-Ottomanism”, *Critique*, Spring 1998, p. 40.

个新的土耳其，在这里，忠诚不是由任何排他形式的种族和语言特征决定的，而是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辉煌过去的依恋。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经历基于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原则的“文明现实主义”向运用硬实力的道德现实主义过渡，从基于软实力的睦邻外交向立足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实践转变，在中东强调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伊斯兰认同，在中亚强调突厥人相同的种族和语言基础，在巴尔干强调曾经的文明共处和欧洲国家的历史认同。“如果说帝国视野和文化多元是‘新奥斯曼主义’的两根支柱，随着正发党执政地位的日益稳固，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对外政策中，‘新奥斯曼主义’强调‘文化多元和共存’的一面黯然褪色，而‘帝国视野和大国野心’和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的一面则日益突出。”^① 这凸显正发党政府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时代解读和应用，也体现了该党对凯末尔民族主义的消解和重塑，借此成为中东地区大国和“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

第三，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精英倾向加剧精英与民众二元对立，但其公民、宗教、族群和文化底色促使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呈现对抗、重构乃至合流趋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中极具号召力的两种激进政治思潮，是推动权力与秩序变迁的巨大动力”^②，在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呈现出互动性。凯末尔政权以民粹主义为口号，实现“民族—人民—国家—政党”之间联系制度化，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将民众的种族、政治、宗教和文化认同体现在政治纲领中，但其重塑社会的过程却孕育了一个以民众之名的精英阶层，加剧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断裂。所以说，从凯末尔时代以来，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就被两种力量所撕扯：一种是存在于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的世俗的、西方化的土耳其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和普罗大众是“他者”；另一种是生活于边远乡村和小城镇、固守伊斯兰传统的土耳其人，他们视凯末尔民族主义精英为国家权力的主导者。二战后，多党制下的左右翼政党开始动员下层民众来质疑甚至挑战凯末尔民族主义精英，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得当选或连任，从政治中心向外围获取重要利益。佛罗兹·艾哈迈德认为，民主党“强调民粹主义和人民主权，并要求政治主动权应从下面、从人民中来，而不是从上面、从政党中来”。^③ 埃杰维特则采用将其与“人

① 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6页。

② 林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联系及反思》，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第89页。

③ [美国] 佛罗兹·艾哈迈德著：《现代土耳其的形成》，第138页。

民”等同的左翼民粹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放弃‘只有知识分子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的说法，接受人民完全知道他们利益所在的事实。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人们没有投票给改革派（即共和人民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落后，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改革派与他们的关系疏远了”。^① 土耳其边缘社会阶层向权力核心的过渡，借助民主选举而掌控国家政权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表现，成为多党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呈现合流趋势，“由于民粹主义将人民概念外化、扩展，人民的内容得以重塑，具有了民族性成分，从而将民粹主义推向右翼，与族群民族主义在政治光谱上实现了趋同”。具体而言，“民粹主义以人民主权、大众民主为根基，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民族主义从民粹主义那里吸纳了这些资源，常常以人民之名追求民族利益。民族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一支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民族国家原则之上，族群民族主义一支则追求民族主权和身份认同，共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② 这在土耳其正发党的政治实践中得以贯彻。执政之初，埃尔多安把自己描绘成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正发党的话语主要围绕弱势群体与掌握军事、官僚、司法权力的凯末尔主义精英之间的对抗，但这种情势逐渐被国家内部的权力对抗所取代。正发党的民粹主义话语让位于以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为主的话语即埃尔多安主义，实现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是一种极具政治动员力的思潮与运动，它首先对国内权力关系、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继而会在外部变迁或压力的刺激下，与民族主义同频共振，将冲击波输出到国家对外事务，以激进或保守的不同方式影响世界政治既有秩序。”^③ 这是正发党的民粹主义转化为土耳其基于自身利益参与和影响地区秩序的动力，不仅使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更趋复杂化，也是导致埃尔多安主义成为中东地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思潮。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Feroz Ahmad,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 - 1975*, London: C. Hurst & Co. Ltd, 1977, p. 313.

^② 林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关联及合流》，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第153页和第154页。

^③ 林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联系及反思》，第101页。

Nations and the Quarte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on the issue of Hamas has given way to great power games and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trategy, Russia strives to maintain a neutral position on contact with Hamas as one of means to gain a voice on the Palestinian issue and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nd takes contact with Hamas as a topic in its dealings with Israel, as well as a carrier of close relations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politics, the driving force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Hamas mainly comes from domestic security policy and national policy towards Muslim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ng – term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Russia and Hamas value each other's strategic value and are also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contact. However, Hamas is not the core interest of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only one of the Palestinian organizations that Russia interacts with, and other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 are also engaging and even cooperating with Hamas. Therefore, Russia'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s Hamas has its limitations.

Key words: Russia's diplomacy; Palestinian issue; Hamas; engagement policy; new round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A Study of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Atatürk Nationalism and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Li Yanzhi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nation –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activity field of moder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prerequisite to maintain the un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f modern nation – stat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ism element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 Turkish nationalism takes part in the nation – building and presents different dimensions. Political nationalism is founded on territorial identity and defines the boundaries of Türkiye and takes Anatolia as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 which has laid the territor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identity. Civic nationalism takes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urkish citizenship, which constitutes the legitimate base for Turkish nation – building. Focusing on the unity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cultural nationalism takes Turkish language and writing as the media to consolida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urks. Ethnic nationalism seeks the scientific base of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sens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dentity, the historical view of

homology and the evolutionary ide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pluralism, instrumentality and even contradiction embody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paradigm of Turkish nationalism, but its different dimensions have allowed ethnic issues to emerge as a byproduct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giving more room for Neo – Ottomanism and promoting the convergence of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All these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e trends of world’s nationalism, the rising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nationalism; Türkiye; Mustafa Kemal; nation –building; nation identity;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ürkiye

Wei Min & Liu Hongze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the country’s social governance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fter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cept with state power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led social govern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s from government – led to pluralistic co –governa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ization, Türkiye entered a period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complex social governance led by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govern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ürkiye mainly promoted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ree path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s the core demand to stabilize the social foundation; building a multi –fiel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strengthening Islamic cultural 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o reduce the risk of social conflicts.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20 year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ürkiy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national economy achieved rapid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achieved long – term stabilit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governance also faces the following prominent problems: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down,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focus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shifted, and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en inhibite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control has intensified social division and antag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xploring ways to modernize their government’s